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18.10.001

生态批评对巴赫金文学理论的绿化与开拓

胡志红¹, 余巧林²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成都树德怀远中学,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 生态批评是对引发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综合文化诊断和文化回应,其试图通过对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研究,发动人类文化的绿色革命,甚至构建生态诗学体系。其内容庞杂,其中,对现有具有生态取向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借鉴与绿化也是其重要议题之一。本文就西方生态批评对巴赫金交往对话理论所蕴含的生态内涵的发掘、对它进行绿色改造的两条可能路径,以期对国内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有所启发。

关键词: 生态批评; 理论借鉴; 巴赫金; 对话理论; 绿化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18)10-0001-08

引言

生态批评是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催生的文学、文化研究,是对引发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综合文化诊断和文化回应,其试图通过对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检视,一方面深挖、分辨、涤除人类文化中的反自然文化沉渣,另一方面也试图拯救、发掘、凸显文化中被压制的亲自然文化智慧,拒斥当代文艺理论中自然的赤贫或缺位,阻止其对消费主义式末日狂欢的迷恋,以推动人类文化的绿化,进而构建生态型人类文化,借此塑造生态型人格,从根源上消除人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重拾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探究深沉,内容庞杂,范围宽广,其中,对现成文艺批评理论的借鉴与绿化也是其重要议题之一。

具而言之,生态批评是以大地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或者说,生态批评背离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研究范式,试图确立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研究新范式,并提出了构建致力于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诗学体系的宏阔绿色生态目标,为此,将现有的文学理论进行绿色改造,使它成为生态诗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批评家对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的交往对话理论的借鉴、绿化、重构,就

是文学理论开始走向绿色之途的重要尝试。在此,笔者就西方生态批评对巴赫金交往对话理论所蕴含的生态内涵的发掘、对它进行绿色改造的两条可能路径,即“基于关联的他者范式”改造和“生态女性主义”改造进行简要的探究,以期对国内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有所启发。

一、巴赫金的绿色生态之路——巴赫金理论的绿色化

虽然巴赫金以及他的同伴们的理论从未言及生态学或生态女性主义,但是他的理论蕴涵着深刻、丰富的生态思想,所以无论是生态批评的理论家还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家们都极力向巴赫金寻求理论支撑或将巴赫金绿色化,让他的理论成为生态批评的一部分,有的生态批评家甚至认为巴赫金的理论就是基于“关系科学的生态学的文学形态”^{[1]372},那么,为何巴赫金理论对生态批评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具体来说,生态批评家们看重的是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时空体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以及开放性、未完成性等范畴,因为它们体现了浓郁的生态平等意识、系统意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意识和地方意识(the sense of place)。其中,系统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都在当代“硬科学”,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海森堡的不确定原则、混沌理论以及生态学等

收稿日期: 2018-08-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第一作者简介: 胡志红(1965-),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英美文学、文化及生态批评。

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并正在促使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从笛卡尔-牛顿的二元对立的机械世界观向有机整体的世界观转变。这些转变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必须拒斥基于十九世纪的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过时观点。然而,总的来看,文学研究对这些新的观点的吸收实在是太慢,以至于当代的文学理论中的新批评将过时的哲学观推向极致,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孤立的艺术品,斩断文学作品与外面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一切联系,采用科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后现代批评理论仍然沉溺于语言分析,而语言世界之外的自然世界要么被忽视,要么轻描淡写。而巴赫金文学理论吸纳了大量的关于系统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因此,如果将巴赫金理论经过适当的改造,就会丰富生态批评的理论。

在竭力绿化巴赫金的过程中,生态批评学者们发现,没有任何距离、等级、规范的整体、大众同欢乐的颠覆性意识是巴赫金对话理论所蕴藏的重要生态资源。在狂欢节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相反,具有一种贬低化倾向,也就是“把一切崇高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即大地(人世)和身体的层次”。所有的人都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理想的、平等的大同世界。这完全合乎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式是不拘形式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关系,狂欢中没有距离、等级、规范。平等意识,关系意识,多元共存意识,反对统治、垄断、独占,这就是巴赫金理论中体现的生态思想。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其进一步改造,丰富和深化了生态批评理论。以下就将巴赫金的理论在分析风景写作的效用来阐明它与生态学的关系。

首先,我们将简要分析巴赫金交往对话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应用。在巴赫金看来,再现现实的理想方式是对话形式,通过对话多种声音或不同的观点可相互碰撞;相反,独白形式倡导单一的言说主体,压制一切不适合他的意识形态的声音或观点,这不仅是反民主的,而且也是反生态的。在讨论对话理论时,巴赫金命名了作者语言、叙述者语言、人物语言、穿插文类等,作者运用各种手段以达到社会声音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是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赋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存在的价值。生态批评理论首先认为,自然生命网中所有的存在实体都应该得到承认,并且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才开始探讨作者如何再现自然风景中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话理论首先强调的是相互冲突的声音而不是突出叙述者武断、独白式的声音。通过对话,我们听到了曾经边缘化的人物和自然中各种因素的声音,对话关注的是各种具体人物或自然因素相关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雷同,“人物区”或“语言区”赋予每个人物或因素不同于叙述者或人物的独特的声音,通过分析这些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可以理解与不同人物或不同因素相关的不同价值观,以及人物与风景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其次,通过探讨风景文学之间的互文性也可凸显矛盾的声音。正如每个表述都是对另一个表述的应答,所以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应答^{[1]374}。意义是取决于表述的语境,这个语境涵盖所有之前的文本和大量的当代的不同声音,甚至也包括未来的文本与声音,因为“伟大的作品将会生活在遥远的未来,后代将不断充实其涵义”^{[1]374}。伟大的作品既包含、融合了过去的营养,同时也包含着未来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后代不断被发掘出来,被赋予新的意义,充实新的涵义。这样的观点适合生态文学,因为它有助于发掘文学作品与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大卫·梭罗尤其有意识地了解、应答许多过去和当代文本,并且基于它们建构自己的文本,将阅读中获得的各种事实和趣闻轶事编织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风景写作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反驳别人的观点,就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里,他不仅回应了某些作品的观点而且还反驳另外一些作品的观点^{[1]375}。梭罗、杰弗斯(Jeffers)和西尔科(Silko)的作品与它们之前的作品以及与同时代的风景作品之间在观点上就有不少冲突之处。

对话主义的互文性特征只是巴赫金的大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在巴赫金和达尔文看来,每个生物在界定自身时,只有通过智力上、精神上以及身体上与其它存在物相互作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自我”。“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演进”^{[1]375},巴赫金欣然将这种观点运用到他的文学理论中。正如批评家常常指出,没有城市和宫廷,当然就没有田园传统中的乡村。但是,对于巴赫金而言,对照并未就此结束,实体之间的相互碰撞是无穷的,这样就形成了任何给定文本中相互冲突的不同声音之间呈现多声部性和不协调性。

另外,与互文性有关的是分析某一文本中的体裁的功用。对巴赫金来说,体裁总是集体性的,显示出社会力量在起作用,相对来说,风格总是个性化

的,其重要性要小的多。在讨论风景写作时认识到体裁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作为人类文化建构的产物,体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在一文本中现实是如何认识的,风景写作往往集多种体裁于一身,巴赫金将文学史看成是小说与其它现成文学体裁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其它文学体裁的小说化(《对话·7》)。风景写作长期卷入这场争斗之中,像小说一样,风景写作不愿如诗史一般作为一种固定的文类延续下来。

再次,开放性(open-mindedness)或未完成性(incompleteness)、未定论性(inclusiveness)是风景写作所显示的重要价值之一,在麦克道尔(Michael J. McDowell)看来,其价值可能胜过它对于小说的价值^{[1]376}。这种特性表明作者愿意继续对话,不愿意最后定论,以期进一步发展。虽然“结束”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是令人愉悦的,然而同时也暗示作者的观点已经完美无缺,至少自认为如此,所以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尝试性和愿意从自然中学习是风景写作的两大典型特征,再加上其“开放性”特征,它暗示的不只是作者的谦卑,还有一种伦理立场,那就是任何个人和时代都不可能垄断真理。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chronotope)对分析风景写作尤其重要,作品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空体。时空体指的是“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这个词借自生物学,在数学上被爱因斯坦用作其相对论的组成部分,表示时间与空间或地方之不可分割的特性(时间作为空间的第四维度)(《对话84》),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巴赫金更多地谈论时间,较少谈论地方或空间,然而他提出的时空体理论开始探索文学中风景与情节的关系。^{[1]376}

生态批评就很关注文学中巴赫金式的时间与地方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少当代美国文学来看,描述的往往是城市生活同一性,虽然超市、郊区的名称变了,但是城市生活的体验是雷同的。这实际上贬低了地方特性,忽视了一个地方能够产生某类人物和某类情节的人与自然独特的历史,这种贬低实际上有助于产生社会的趋同现象,社会成员都可因工作的需求轻松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正好合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官方文学、正统文学的理想,这种文学就像推土机般推平所有地方的小山,使整个美国文学都均质化、齐一化。推而广之,全球化也是试图使所有文学失去本土化,达到全球化,以便“安全交流”。实际上,文化的均质化、单

一化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多样性的丧失,给自然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将人类引向生存危机。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促使我们发掘作品中对地方的再现情况,甚至对“大地没有兴趣的”作品也予以重视,时空体将故事、地理、自我连接在一起,提醒我们注意植根于大地的文学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充满乡土气和民俗的因素。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寻找,它们就存在于文学中。巴赫金列举了文学作品中不同的时空体,像“路的时空体”“公共广场时空体”等,然而,研究它们到底有何意义?巴赫金是这样回答的:

它们是小说中基本情节事件的组织中心,时空体是情节事件连接和脱离的关节点,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情节事件的意义取决于它。

……时空体使情节事件具体化,赋予它们血肉,让血在血管中流淌……小说中所有抽象的因素——哲学和社会的概括、思想观念以及因果分析——都指向时空体,因它而有血有肉,从而使艺术想象力发挥作用。(Dialogic250)^{[1]378}

如果说情节意义存在于时空体的时间和地方的具体的关节点上,那么对情节事件中风景的分析不仅对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理解情节事件的意义也非常关键。

巴赫金也意识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认识自然的观点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作为自然的参与者到自然作为视野的风景(人所看到的),再到自然作为环境(背景或场景)。如今风景画的自然的“残存物”已经成了被“封闭的文字风景”围困的景点,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开始转移到封闭的、私人空间”(《Dialogic. 143-144》)。此时的“自然早已不是生活事件中活生生的参与者”,“它已经断裂成比喻和衬托以便使个人、私人事件和冒险变得崇高,这已与自然本身固有的方式毫不相干”(《Dialogic. 217》)。今天,不少作品依然将自然看成是人类重要事件的背景,它们与外在的自然毫不相干”^{[1]378-379}。

与电视等媒体推崇的遥远的、人为框定自然的理想相对照,巴赫金提出了田园景色的时空体,它曾经在小说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巴赫金将田园作品看成是恢复“民俗时间”(folkloric time)的范式,在田园作品中时间与空间或地方的关系是“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生命、事件与熟悉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与它的熟悉的山山水水,田野森林,还有自己的家联系在一起,田园般的生活以及与其相关的事件与世界的具体的角落是不可分割的。”

(Dialogic225)^{[1]379}

总之,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田园作品自身的局限导致它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逐渐被淡化,它只能涉及生活中几个基本事实,诸如爱情、婚姻、生死、生息、繁衍等,但是“田园情结”(idyllic complex)一直影响以后的小说。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小说家开始思考人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过程切断了先前与田园作品的一切联系。巴赫金似乎想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联系在田园时空体中以微弱而又升华的形式延续下来,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都有表现时空关系的优秀作品,现在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时候了。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arnivalesque),狂欢化理论强调挑战权威,倡导生态民主意识,这种民主意识渗透到生态批评的方方面面。该理论在他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书中作了全面的阐释,它将人的注意力从风景转到身体以及人与人的交往。在巴赫金看来,每个表述都是“语言生命中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两个对立倾向的统一体”^{[1]380}(Dialogic272),其中一个具有向心、统一、集中的倾向,产生艺术散文体裁,有助于文化、民族、政治的集中;而另一个却有离心、分散和去中心化的倾向。巴赫金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狂欢节作为对立倾向的例子解构中心和挑战官方和正统的现成秩序,“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即大地(人世)和身体的层次”^{[2]249-50}。各种“低级文体”,像仿模、戏弄、亵渎、民间诙谐、流浪汉体和趣闻轶事等,行使这样的功能。在此,除了不同的社会语言观点的相互碰撞,没有语言中心,这种情形被巴赫金称为“普天同庆”或“狂欢节的世界感受”^{[1]380}。

“狂欢”充满着生态民主的精神,因为它挑战权威、挑战经典。如果你是一位生态文学家,那么你就应该以生态中心主义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还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崇尚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和谐,不仅要反对种族歧视,而且还要反对物种歧视。

正是这种狂欢节般的倾向反击官方的、权威的独白,才有了梭罗(Thoreau)、杰弗斯(Jeffers)、西尔科(Silko)这样一些风景作家采取多元化、多样化的观点,因此也才有可能更准确地再现自然风景。殖民时期很少有这种倾向,风景写作是独白式的,是为殖民统治起宣传作用,像威廉·伍德的《新英格兰的前景》(New England's Prospects)以及弗朗西斯·帕克曼

(Francis Parkman)的《俄勒冈小径》(The Oregon Trail)对印地安人非人化的处理方式都是如此。当然,近来的作家通常尽力抛弃早期人类的偏见,进入自然世界,好像他们是动物式的参与者,再现叙述者与再现动物般的参与者几乎是一样的。似乎他们希望让风景进入他们身体,然后通过写作更好地表达出来。“自然进入身体不仅仅是比喻,肌肉与伤疤见证身体与自然的亲密接触。”^{[1]381}巴赫金在讨论狂欢化理论时推崇这种非智力的、通过身体认识世界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拒斥等级社会为自己创造的抽象的、精神的、官方的现实,挑战自然/文化、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观念。

巴赫金对狂欢化的思考类似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在《发现乡土风景》一书中分析风景时对“官方”与“乡土”所作的区别。杰克逊的乡土风景是民间风景,与一个地方的地貌协调的,且能满足本地的需要。然而,官方风景是不顾地方差异强加于它的,是我们知识中经常能够看到的、惟一的风景。杰克逊竭力呼吁承认地方风景的独特价值,可是其常常遭到外来开发商和经济势力的毁坏。在“就业与环境”的争论之中,直接的、短期的经济需求往往压倒长期的、环境的好处。此外,还有一种更富浪漫色彩的官方风景与这种掠夺型“官方风景”截然不同,它甚至不惜牺牲地方经济为代价,而日益将自己强加给地方经验:令人回忆过去的国家森林风景区,那里有茂密的森林、未筑堤坝而自由奔放的河流、未耕作过的国家草原和从未放牧的联邦政府野生动植物保护地,这些地方几乎无人居住,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这片土地就像欧美人来临之前的样子^{[1]382}。

但是,这依然是人造的风景,是对自然权利的压制。

虽然大众传媒竭力将多数美国人打造成为努力过上官方认可的高收入、殷实富有的人物形象,但是地道的民间乡土风味还是许多欧美人向往的。因此,融入自然风景的古老传统的方式,不论存在于何处,都成了研究、书写和了解的素材。这就是巴赫金指明的方向,也是一条蹊径,沿着这个方向,当代的风景作家常常走在我们的前面。

二、基于关联的他者范式(the model of otherness)的确立

生态批评家默菲(Patrick D. Murphy)也致力于巴赫金理论的生态改造。提出确立基于关系的他者范式(the model of otherness)以取代基于对立的他

者范式(the model of otherness),直至建构一个立足比较文学观点(跨学科与跨文化),尊重差异性、崇尚多元性的开放、包容的生态批评理论。

在他的生态批评论著《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 Oriented Literature, 2000)一书中,默菲明确地提出应该顺应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要求,用基于平等的、关系的、伙伴式“他者范式”(the model of anotherness)取代基于等级的、孤立的、对立的“他者范式”(the model of otherness),为此,他走向巴赫金寻求理论支撑,并将他绿色化,以便让绿色巴赫金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

在《论行为哲学》(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一书中,巴赫金提出了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构成时段,即“我为我自己”、“他者为我”和“我为他者”。以后,他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他又对两类不同的“他者”作了明确区分。即另一个人与陌生人、他者,英语中的“我/他者”(I/other),其中的“他者”蕴涵疏离和对立的语气,而在巴赫金的“他者”(another)却无此意,巴赫金的他者性(anotherness)对“我”(I)并无敌意,而且是“我”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将巴赫金的基于关系的“他者”(anotherness)引入英语语言之中,因为从根本上说,自我与他者(self/other)的二元对立远远不能再现世界上基于关系区别的范围^{[3]96}。在他的《论行为、艺术和责任哲学》一书中,巴赫金谈到了“责任”(anserability)。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参与性的思想家,他对世界的责任指的是“内在生活并非意味着为自己而活,而是从内心做一位负责人的参与者,肯定自己真诚的、实在的、责任的存在”^{[3]96}。责任伦理预设了有差异的关系,承认超越矛盾和差异的相互性,人的一切没有一点本来就是陌生的,而是因为需要才认为“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也就是说,“陌生”或者是由于视角的不同、认可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认同程度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在巴赫金看来,“生活中有两个基本不同的价值中心,然而相互关联的:我自己和他者……一个相同的客体(内容相同)是存在的一个时段,当从与我关联的价值视点或从与他者关联的价值视点来看,就呈现出不同”^{[3]97}。启蒙运动时期建构的疏离、对立、绝对的他者以及将它归入心理分析的范畴,忽视了从大都市的多元文化特性到病毒变异等世界多样化的活生生的现实。这种建构基于、也强化了西方晚期的一个基本的个人观念和通过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赞美主体性观念的普遍阐释。

从历史上来看,自我/他者的二分被转化成精神/肉体、男人/女人、人类/自然的二分,其中女人、自然是精神、文化对立的体现。这些成对的词实际上并非二分,仅仅表示在一个大的、复杂的场中观念化的极端表述,像行星、思想、性、认识、森林等。就人类/自然的关系来看,这些词不足以表达人的实践范围——有人认为人处于自然之外,有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有人认为人优于自然而又参与自然。我们反复遇见的是建构疏离、对立的他者,其目的在于压制群体之间的关系,将一个群体或一个文化客体化、疏离化以服务于某种统治形式。

欧洲的侵略者给予北美土著人不同的称谓,不管是“高尚的野人”(noble savage)还是“冷酷的野人”(bloodthirsty savage),其目的都是为了压制最初认可的共同的人性。为了强占别人的土地或推翻别人的政府,就必须首先确立他们不是同等的人。简言之,建构绝对的他者会将亲朋变成敌人。

巴赫金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一书中,巴赫金提出了自我、心里和意识内容三个概念之间的对话关系,并指出作为社会-自我建构的个人是在给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时空环境的诸多参数中成长的。也就是说,任何个人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他的或她的自我,通过像老师、父辈、配偶、邻居、朋友等多重主体性位置,他参与了自我和他人的建构,“在社会之外,在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外,没有作为人的实体存在”^{[3]98},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将此观点进一步拓展,认为人不仅是文化的存在实体,同时也是生物的实体,“身在自然环境中,人类并不绝对‘在我们里面’,同时也在我们与世界的对话之中”^{[3]98}。也就是说,人是社会、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地理心态(geopsyché),或正如葛雷戈里·卡热(Gregory Cajete)认为“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人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间就会产生相互作用,我们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都直接受到气候、土地、地理和该地方的生物的影响”^{[3]98}。

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相互激活或曰人的心理和所处地方之间的相互激活的对话方向强化了生态女性主义对相互依存和自然生态多元性的必要性的认同,这种方向要求反思“绝对他者”和“绝对他者性”的概念。如果巴赫金的基于关联的他者范式的状况得到认可,那么,在建构充满活力的人与自然的相互

作用的范式时,相互激活的生态过程——人与其它实体通过日复一日的相互影响、发展、变化、学习的方式——必须予以重视。

基于巴赫金的关联的他者(anotherness)对于研究多元文化和环境文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关联的他者要求跨文化比较研究,而不是从传统的中心-边缘的视角进行比较文化研究,后者将居于中心的传统、标准或民族文学风格作为标准比较其它文学。此外,关联的他者要求密切关注环境文学中描写关系或基于关联的差异性的方式,即作者如何处理他或她与其它实体的关系。

总之,关联的差异性概念源于非二元的、多元主体建构的批评策略,反过来又强化此策略。这些批评策略主张倾听其它受压制的言说主体的声音——文学的和批评的、人的和非人类的,不管这些声音是来自我们正在学习认可的实体的声音,还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基于关联的差异性的观念有利于产生环境写作的不同范式,这种范式将关系的栖居作为根本的世界观来分析文学作品,因为现成的范式不足以涵盖环境文学的类型,或不能够分析研究当代文学中人类-非人类关系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地球心理的产生和生态系统的地域特性。此外,在默菲看来,巴赫金的他者观念以及随它而来的对关联性差异性的重视,为生态批评成为更具文化多元性和国际性的批评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巴赫金理论的绿化

生态批评不仅要让巴赫金走向自然,还要让他走向女性,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统治女性和统治自然的逻辑是一致的,二者的文化框架是同一的。创造生态女性主义对话方法要求对巴赫金的观念进行大的改造,因为巴赫金本人以及他的同仁都未谈及生态学或女性主义,经过改造的对话理论可以凸显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差异性的统一观念——而不是消除差别的拼凑,它继续保持女性主义思潮中主要派别的自我意识、反教条的特征。同时它也进一步纠正生态女性主义中已经存在的各种自由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势头。

巴赫金理论的生态改造可作为批判多元主义的武器。巴赫金对话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争论的方法,考量冲突的观点而不至于沦为自由主义的多元论。鲍尔(Dale Bauer)在她的《女性主义对话理论》

通过区别多元论和多声现象(multivocality)有力地说明了,如果要在保留分歧的前提下获得共识,就需要通过认真的对话,然后才有新的理解,而不是不同观点的文字上的大杂烩^{[4]229}。埃伦·罗尼(Ellen Rooney)对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的一个流行神话——多元主义,予以毁灭性的批判,同时对作为批评话语学术形式的多元主义也予以深刻的揭露,因为它企图将所有的批评家哄入无聊的刚愎自用的学术圈中。虽然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成员表示异议,但它否认变革的必要,除了微小的调整,竭力避免任何大的争议,因为它会“揭露试图将批评话语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捆绑在一起以建构混杂而又霸权的话语系统的具体体制的真相”。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多元主义并未包括所有人:“我们的文化话语是个并不涵盖一切的整体,如,它并未包括妇女,她们肯定不是文化建构的那种人。”^{[4]229}也应该注意到,自然是否也应该作为主体,而不只是作为被它关注的客体纳入它的范围。

鲍尔的批评理论的奠基式作品《女性主义对话理论》已经突破了仅仅把巴赫金的多种多样的有关对话的论述当成原材料的其他作者,鲍尔也了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综合协调和指导女性主义关于文学文化的理论的方法。她的文学分析反复穿梭于审美文本与父权制下的文化语境、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利之间。但这不足为奇,因为运用对话理论的批评家总会在文本与语境之间、话语与社群之间、个人与政治之间不断地穿梭。

鲍尔发现了巴赫金理论的不足,她认为“巴赫金理论中缺乏的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实践中所具有的对性别理论或性别差异的关注”。然而,在默菲看来,鲍尔分析中缺少的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所以,默菲将对巴赫金进行生态女性主义化的改造^{[4]229}。

传统的女性主义在父权制标准和强制性排斥的范围之内运用解放策略,这不仅仅试图让受压制的人讲话,而且也试图挑战父权制不断制定的虚幻的标准。现在已到了文学批评家更系统地探寻解放策略,以便让更多的生态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应该以这些解放策略之词批评其余的文学作品,不管它们是否已经成了经典化的作品。同时女性主义的批评尺度必须与迅速发展变化的自然书写和环境文学的标准发生联系,因为至少就《诺顿自然书写文集》(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1990)来看,其主旨是让自然成为一个明显地受制于白人男性作者统治的领域。时至今日,以国际性批评运动为宗旨

的生态批评仍然是由白人男性主宰。不少理论家提出了女性主义对经典批评的尺度,在这些尺度中,有的尺度相互冲突。就所提出的生态尺度的情况来看,仍然是片面、散漫的,有走向经典标准相对化的倾向。

生态批评家对巴赫金理论予以生态改造,其目的是为了以生态的相互依存观念取代传统女性主义的自主独立的解放观。巴赫金理论的对话倾向强化了生态女性主义对相互依存和自然多样化的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要求反思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由心理分析建构而不是生态建构主导的“他者”和“他者性”的概念。如果承认他者性和他者的地位只适用于妇女和潜意识,那么,巴赫金的基于关系的“他者性”(anotherness)的观念,也就是为了“他者的他者”,一定未得到认可,这样,相互激活的生态过程——人和其它实体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相互影响发展、变化、了解——将得不到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观念曾经充分考虑到她们所遭受的社会压迫的具体情况,这对女性来说是有帮助的,然而,很遗憾最终以默认传统父权制的自主观念和个人主义而告终。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已注意到惟有浪漫的男性中心主义才会傲慢地将独立自主置于其它一切关系之上,虽然美国一直是一种推崇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然而它却总是不愿意容忍个性,尤其当这种行为危及“国家安全”或“美国的生活方式”^{[4]231}时。生态女性主义对话理论主张不要盲目臆造独立自主的解放观念,而应该通过理解存在于人与非人类自然之中的“自愿的相互依存”的理论内涵,更富有创造性地构想负责任的人类行为。

巴赫金的离心/向心张力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抵消系统分析和系统批评而导致的总体化倾向的途径。向心倾向趋向集中、均质化、约束。离心趋向于四散、分离、变化。对于巴赫金来说,任何“总体”(totality)已经成了相对化的、暂时的,需要离心分散的向心实体。也就是说,对话暴露了中心/边缘二分的虚假,二分被对立团体用来认可现成权利机构对其合法性、中心性、权威性的认可。这种关系中的权利分配并不均衡,但是,如果相互依存的自然范式有效适用的话,那么除了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边缘之外,没有真正的“边缘”,当然,也没有真正的“中心”,这是因为文化和自然中所存在的离心倾向抵制这种边缘化和中心化的产生。

正如“他者”参与自我的建构,所以作为世界个体(individual-in-the-world)的自我也参与各种

形式的“他者”的建构。同样,正如自我进入语言,运用言语(parole),所以“他者”也进入语言,像任何实体一样,虽然向心结构和文化力设置障碍,但是,也具有成为“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的潜力。作为言说主体的这个“他者”的涵义在观念上不仅仅指人,也包括不是言说主体而是帮助“他者”主体化的言说者或作者^{[4]232}。关键的问题取决于如何看待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如何看待成为言说主体前提的言说者享有的主动权,如何使得其他的言说主体在这个符号系统里能不用人类的言语而言说但也能够被人类理解。至少,诸如此类的考虑有可能让人类突破简单化的观念——因为他们能够理解相互的语言,所以只有他们能够沟通交流,而其它的生物不能。

从《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的开篇,巴赫金就重视心理学中内心的语言和外部语言之间冲突以及内心语言的各个层次的意义。意识层和无意识层的沟通由具体的表述构成,表述都有一个说话者和应答者,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二者并不相同,但都是同一心灵的组成部分。甚至利用表述极小的力量,潜意识的表达也成了社会的相互关系。因此,“他者”总是参与心理活动中,同时也表明自我并不是孤单的或统一的,而是多层次的,这已经与生态学和女性主义有了牵连^{[4]232}。

正是认识到心灵的非同一性和内心对话的需求,尤其存在于心灵的“男性”和“女性”方面之间,生态女性主义看到深层生态学主张中存在的不足,这就大大削弱了它对父权制霸权的颠覆性。正如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说的是多种语言”。也就是说,为了沟通交流,它运用多种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意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的精神活动,这些表达是向着外部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多层建筑的部分。因此,默菲(Murphy)认为“像潜意识一样,非人类自然界也操着不同的语言表达自身”^{[4]232-33},也需要与“他者”沟通对话。

如果说情感与本能来自历史的自然对物种演进的影响,那么它们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以及进入我们的意识是自然界通过意识运用的言语符号对我们“说话”的形式。所以,将“情感”(emotion)斥为女性、“本能”斥为原始自然,其目的是只将言说主体的角色留给自我(the ego),剥夺“他者”的声音,“他者”实际上也是我们的组成部分。难怪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呼吁建立“长老会”以

代表民主政体中的非人类世界,在该组织中通过艺术的形式人化自然,自然(动物、植物、山川河流)通过人类述说和阐明自己的观点,成为言说主体。斯奈德认为,我们必须“把其他的人——苏人(印地安人的一支)所尊称的地上爬的人、地上站着的人、天上飞的人和水里游的人——包括在政府议会中……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造我们的反……现在我们从天上、地上、水里诈取的要求都是未经协商的”^{[4]235}。施奈德的话中蕴藏着深刻的生态中心主义民主意识。也就是,他主张人类应该尊重非人类的自然,并让它们成为权利的主体,不管它们是否是人类利益的载体。否则,被压迫者(自然)将会造反,这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J, MCDOWEL L. The Bakhtian Road to Ecological Insight [M]//In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Ed. Chery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2]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下册 [M]. 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PATRICK D, MURPH Y.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 oriented Literature [M].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 [4] KAREN J. Waren,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结语

简言之,生态批评一方面对现成的文学理论进行清理、批评,揭露其基于传统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反生态本质,解构颠覆其极度张扬人性,压制自然、女性以及其他一切他者的文化机制,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建构其生态诗学理论,探索建构生态批评理论的策略,以重构生态文化。其中绿化、拯救具有生态思维、生态学视野的文学理论就是建构生态诗学、绿化文学、文化生态的重要途径,因为绿色的文学生态、文化生态给人类、自然带来和解、共生的希望。

On the Gre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Bakhtin's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U Zhihong¹, YU Qiaolin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2. Chengdu Shude Huaiyuan Middle School,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Ecocriticism, which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culture, even arts and the environment, is the comprehensive cultural diagnosis and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 root which results in ecological crisis. It aims to launch a green cultural revolution, even to construct an eco-poetic system. Its content is very rich, of which a key agenda is to borrow existing literary theories with ecologically oriented tendency and to green them. The paper will briefly discuss how western ecocritics dig out ecological meanings of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ics and the two possible ways to green it. The authors of the paper wish that their exploration were a lesson to ecocri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criticism in China.

Keywords: Ecocriticism, Theoretical borrowing, Bakhtin, Theory of Dialogics, Greening

(责任编辑: 孔明玉)